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从“和平外交” 到对伊朗战争

特朗普政府在中东低成本维持霸权范式的终结

负责人：周玉渊

作者：周玉渊 周亦奇 金良祥 姚乐 刘欣 薛纪澜



总第60期

更多免费行业报告

并购家

www.ipoiipo.cn



从“和平外交”到对伊朗战争： 特朗普政府在中东低成本 维持霸权范式的终结

负责人：周玉渊

作者：周玉渊 周亦奇 金良祥 姚 乐 刘 欣 薛纪澜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26年5月

作者简介



周玉渊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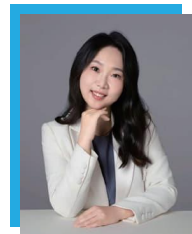
周亦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金良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姚 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刘 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薛纪澜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目 录

摘 要	01
第一章 低成本维持霸权与霸权收缩下的双重面向	04
一、低成本霸权第一面：战略收缩	6
二、低成本霸权第二面：维持霸权红利	8
第二章 低成本维持霸权与特朗普中东政策领域实践	11
一、以实力谋调停：和平外交背后的霸权主义逻辑	12
二、以技术换服从：技术合作背后的霸权主义逻辑	14
三、以盟友整合换取责任外包：《亚伯拉罕协议》2.0 背后的霸权主义逻辑	17
第三章 低成本维持霸权下美国中东布局	20
一、伊朗：低成本霸权下假想敌与目标	22
二、以色列：低成本霸权下安全打手	24
三、海湾阿拉伯国家：低成本霸权之下经济回报提供方	26
四、土耳其：低成本维持霸权中的边缘变量	30
第四章 美以伊战争与低成本维持霸权范式的终结	33
一、战略误判一	34
二、战略误判二	36
第五章 对伊战争后的中东地区秩序展望	39
一、中东地区秩序道义根基将持续被削弱	40
二、中东地区秩序的经济合作基础仍将深受美国影响	41
三、中东地区安全格局重塑仍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	42
四、中东地区战略自主将进一步提升	43

摘要

本报告系统分析了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内中东政策，发现**低成本维持霸权战略范式**是其主要特征。该范式中的交易主义、安全责任下放、过度倚重以色列等行为，强化了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冒险主义。美以对伊朗战争不仅宣告低成本维持霸权战略范式的破产，而且正深刻影响当下及未来的中东地区安全格局。

低成本维持霸权战略范式，体现了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中“美国优先”与交易主义的双重特征。特朗普政府一度希望通过**安全责任转移**，减少直接军事介入以降低自身安全责任，塑造“伊朗威胁”以推动地区盟友承担防务成本，并强化对美装备与情报依赖。为此，特朗普政府不仅纵容以色列军事扩张和地区冒险行径，还以人工智能合作为抓手，引导海湾国家千亿级投资绑定美国技术生态，构建“数字铁幕”，构建新型依附关系。这一战略一度在重塑地区安全秩序上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以实力谋调停**，在巴以问题中淡化“两国方案”，通过建立和平委员会，推动《亚伯拉罕协议》扩大化，实质强化以色列优势地位；**二是以技术换服从**，将 AI 合作与安全承诺捆绑，迫使海湾国家在科技领域选边站队，挤压其多元发展空间；**三是以盟友整合进行卸责**，构建以以色列为安全轴心、海湾国家为经济支撑的排他性阵营，实现安全成本转嫁。

随着近年来中东安全局势的恶化，低成本维持霸权范式不仅未能使特朗普政府在地区事务中扮演好建设性和平的角色，反而作为战争发起者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美以伊战争的爆发对中东局势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一是美国伊朗矛盾进一步激化**。特朗普政府不断加码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支持以色列对伊朗发起斩首行动，并直接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这些行动也使伊朗在绝境中奋起抵抗并展现出韧

性，使美伊冲突陷入僵局。**二是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面临反噬风险。**特朗普政府无条件支持并推动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伊朗直接对美国的阿拉伯盟友发动袭击。期间，美国不顾地区阿拉伯国家反对，执意纵容并支持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行径，也引发阿拉伯盟友不满与无奈，同时也引发共和党内部“本土优先派”的质疑与担忧。**三是特朗普政府对海湾国家的进一步拉拢勒索，令海湾国家面临战略选择困境。**一方面，美国利用技术优势不断要求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进行巨额投资，另一方面又不断要求海湾阿拉伯国家屈服于美国全球地缘政治议程，在技术发展中选边站队，同时不断破坏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等地区国家的和解进程。**四是推动特朗普政府与土耳其在相关问题上进行脆弱合作。**尽管埃尔多安借私人关系缓和矛盾，但库尔德问题、以色列政策等结构性分歧仍未解决。

2026年2月28日爆发的美以伊战争，标志着特朗普低成本维持霸权政策正在走向破产。低成本维持霸权战略范式的破产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东政策**不确定性**甚至**非理性**的重要证明，该战略范式不仅没有维护地区和平，反而对地区秩序带来严重冲击。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冒险表明，以交易替代同盟、以打击替代政治解决的短视行为，不仅未能维系霸权，反而付出了高昂的战争代价。这种将盟友工具化、激化阵营对立的做法，严重侵蚀了美国的“道义权威”与制度性霸权根基，加快了中东国家多极化突围的步伐。**中东秩序正不可逆转地从“美国主导”转向“自主平衡”的新阶段。**

从“和平外交”到对伊朗战争： 美国在中东低成本维持霸权范式的终结

特朗普第二任期相比起其第一任期在中东政策上具有鲜明的延续性。在总体方针上，特朗普在中东的政策仍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导向，避免在中东地区过度投入的同时维持乃至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是特朗普两个任期内在中东问题上的核心目标。在美国优先与交易型外交的主导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遵循着低成本维持霸权战略范式，以外交手段，通过交易外交与实力调停，结合其他经济工具，整合地区盟友，使他们在地区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从而在减轻美在该地区负担的同时维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多点发力，对中东地区国家的发展与转型以及地区秩序的塑造带来深刻影响。特朗普政府试图从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与伊朗关系等方面切入，不断推动中东地区秩序向着有利于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方向演进，然而，相关举措不仅未能使美国实现降低地区负担的同时维护地区霸权，反而使美国陷入美以伊战争中，使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

第一章

低成本维持霸权与霸权收缩下的 双重面向

截至本报告完成时(2026年5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延宕近两月,其中高烈度作战阶段持续约40天。尽管美国在此轮行动中投入了大量关键军事资产,甚至以人工智能深度赋能作战体系,使其被广泛视为人类社会的第一场AI战争,但战术层面的收获仍无法掩盖战略层面的窘迫。截至目前,美国尚未达成明确的战略目标:伊朗政权在持续轰炸中实现了存续,而霍尔木兹海峡等战前未被任何单一国家所控制的国际航运通道目前反而处于伊朗方面的实际管控之下与此同时,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所承受的成本持续攀升。一方面,战事久拖不决打破了美方速胜预期,也瓦解了特朗普试图借击败伊朗向全球立威的战略构想;另一方面,美国在中东地区再度陷入“打不赢走不了”的尴尬局面。从更深层的角度审视,此轮美伊冲突实际上折射出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在中东推行低成本霸权维持战略的挫折与失败。所谓“低成本霸权”,是指特朗普中东政策所秉持的“美国优先”与交易主义原则的逻辑延伸。特朗普政府在延续从中东战略收缩的总体方向的同时,为维护美国的地区主导权并借中东政策攫取国内政治支持,主要采取低成本霸权维持模式。该模式具体涵盖三个维度:和平政策、经济发展政策与地区盟友整合。整体而言,低成本霸权维持模式折射出特朗普任期内面对中东地区的矛盾战略心态,既不愿承担地区安全义务、力图削减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又试图以更低廉的方式延续霸权存在、收割霸权红利。

一、低成本霸权第一面：战略收缩

2011年后，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其中东战略随之发生调整，奥巴马政府由此启动中东撤出战略。在第一任期前，特朗普多次质疑美国对中东的深度介入模式，执政后，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与战略克制理念，仍延续中东战略收缩。第二任期后，这一战略得以延续，表现为减少战略投入，避免直接干预。2025年5月，特朗普访问海湾三国期间，在沙特阿拉伯公开表示，美国将不再扮演“世界警察”角色，而是致力于成为地区的“和平伙伴”，而非主权国家的“监督者”。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具有鲜明的“美国优先”导向与交易主义特征，其核心在于以较低成本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与战略利益，但致力于保持在关键国家和关键领域的战略介入能力。特朗普政府一方面继续延续整体战略收缩，推动美国军事力量的适度缩减，另一方面通过灵活的经济、外交与安全手段，在战略性议题上维护美国在中东事务中的话语权和战略影响。战略收缩与局部介入并行模式体现了特朗普中东政策交易主义色彩。

从整体态势看，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可归纳为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战略目标收缩，表现为安全责任向地区伙伴转嫁。长期以来，美国作为中东安全的主要保障者，在海湾战争后逐步形成“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战略布局，并在伊拉克战争后一度成为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塑造者。即便在2009年从伊拉克撤军后，美国仍在中东承担重要安全职能，例如打击“伊斯兰国”等行动。然而，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目标从反恐转向大国竞争，战略重心开始从中东转向亚太，美国需要以色列以及地区盟友承担更大安全责任。2025年特朗普《美国国家安

全战略》中指出，尽管中东地区冲突仍存在，但其严峻程度已显著下降。¹ 特朗普执政风格强调实际回报，对长期承担地区安全责任意愿有限。因此，未来美国可能继续推动中东安全责任向地区盟友转移，保持战略目标的有限性与精准性。

第二，介入力度收缩，体现为选择性使用武力、侧重威慑。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了多场大规模军事行动，从海湾战争展示新时代信息化作战能力，到伊拉克战争陷入长期治安战困境，军事手段一直是美国塑造地区安全格局的主要工具。然而，在当前战略收缩背景下，类似伊拉克战争的大规模直接军事介入已非美国政策首选。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呈现出“轻足迹、重代理、限规模”的特点。特朗普第二任期虽曾对胡塞武装实施打击，并发动美以伊军事行动，但从其主观意愿而言并不愿意以大规模军事作战方式介入中东，美国在战略设计上倾向于以精准、有限的方式使用军事力量，而非重返高成本、高风险的直接战争模式。

第三，调整定位，从“民主推广者”向“有限影响者”的转变。传统上，美国长期试图通过民主推广等方式，深度介入中东国家内部治理，将自身政治制度视为地区转型的标杆。然而，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美国中东政策发生调整。特朗普执政时期，特朗普对意识形态议题的淡漠进一步降低了美国对他国进行政治改造的意愿，政策重心更多转向务实利益与风险管控。因此，美国不再将自身定位为中东地区的“根本改造者”，而是逐步转向一种更具选择性、更注重成本收益的有限参与模式。这一转变与整体战略收缩态势相互强化，预计将在未来一段时期继续保持。

¹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二、低成本霸权第二面：维持霸权红利

尽管美国当前在战略呈现出收缩姿态，但战略收缩并不意味着战略真空，也并非霸权削弱。特朗普第二任期在中东地区追求的是低成本维持霸权，战略收缩并不意味着放弃美国地区主导权，而是采用更为巧妙的方式来维系地区主导地位。

第一，美国通过多重方式转包安全责任，维系区域对其安全依赖。在战略收缩的背景下，美国正以多元方式推动中东安全责任向地区盟友转移，持续强化伊朗作为区域“共同威胁”的叙事，通过塑造地区威胁认知、引导盟友分担责任等方式，实现“低成本维持霸权”。特朗普政府有意降低自身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直接介入，推动地区盟友承担更多安全责任，积极鼓励海湾阿拉伯国家及埃及等国采购美制武器装备，深化双边军事合作，既使地区国家成为应对安全挑战的“第一责任人”，也使其在装备、训练和情报等领域进一步依赖美国，从而在战略收缩的同时仍维持美国对地区安全架构的关键影响力。

2016–2024 年美国对海湾国家军售（TIV）²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总额
沙特阿拉伯	1748	3141	2457	2419	2138	1307	1965	946	799	16919
卡塔尔	288	144	427	805	597	1234	1369	930	572	6365
阿联酋	636	451	800	372	245	326	385	427	192	3835
科威特	126	56	62	7		563	2010	74	12	2910
巴林		20	7	2		180	244	294	848	1594
阿曼	135	89			4	4	0			232
年度总额	9426	11409	9255	10534	10024	10960	15351	11102	13512	101574

资料来源：SIPRI TIV。

同时，美国通过塑造“伊朗威胁”转移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注意力，从而淡化乃

² 注：趋势指标值 (the trend-indicator value, TIV)，为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 (SIPRI) 开发的一套独特的系统，用以比较不同国家军售价值所使用的指标，仅供比较国家间军售规模，不代表真实金额。

至转移原由美国承担的部分责任。这一策略突出体现在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特朗普政府第一任内促成的《亚伯拉罕协议》，开创了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未获解决情况下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先例，将巴勒斯坦议题边缘化。特朗普政府还先后推出的所谓“世纪协议”与加沙停火方案，主要着眼于短期冲突管控与议题降温，并未实质性推进巴勒斯坦建国这一核心政治目标。此举在策略上实现了双重效果：一方面，美国在形式上仍扮演“和平调解者”角色，维持了其在道义与外交上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美国则通过弱化对“两国方案”的实质性承诺，悄然卸下了长期背负的巴以和平进程主导责任。这种安排既降低了美国的介入成本，又将地区国家推向应对安全挑战的前沿，体现了其在战略收缩背景下维系关键影响力的精巧算计。

第二，在军事介入层面，从大规模直接干预转向“离岸平衡”与“成本可控”模式。特朗普政府更加强调战略克制与“实力促和平”的形象塑造，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军事手段作为其地区影响力的支柱。当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呈现为一种“轻足迹、强杠杆”的新形态：

一方面，通过支持地区代理人承担一线安全责任，降低自身直接介入的风险与成本。美方支持以色列扮演区域“强势行为体”角色，注重运用叙利亚东北部的自治力量及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等非国家行为体网络推进其政策目标，积极借助地区核心盟友及非国家行为体来执行其安全议程、维护战略利益。

另一方面，在关键节点实施精准打击或威慑行动，以维持其军事可信度与干预能力。特朗普第二任期内集中对胡塞武装与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进行“快速而决定性”的干预。上述打击目标选择基于如下考虑：一是目标在实力上明显弱于美国，能够确保行动的成功与可控；二是军事行动需能转化为明确的政治或外交收益，实现“小投入、大回报”的战略效果。然而，特朗普时期的军事干预亦显示出明显的“机会主义”底色：若行动未能迅速取得预期效果，美国便倾向于通过外交协议或战略调整实现“止损抽身”，避免陷入长期消耗。例如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虽

持续进行，但在遭遇持续抵抗后，美方转而推动停火安排以降低介入程度；对伊朗核设施实施打击后，美方亦迅速以此为契机约束以色列进一步升级行动，转而推动地区紧张态势有限缓和。

第三，在自身定位调整的情况下，从“意识形态规训”转向“利益交换”。美国并未放弃其霸权地位，而是将霸权成本转化为“霸权租金”，通过经济与技术领域的结构性优势，将安全合作与新兴技术合作紧密结合，形成新的利益捆绑模式，巩固其地区主导权。特朗普第一任期侧重于以军售换取安全承诺，推动地区国家大量采购美制装备以巩固防务依赖。至第二任期，合作重心逐步转向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美国利用自身在人工智能技术、标准与生态方面的领先地位，引导海湾阿拉伯国家等地区伙伴加大对美技术投资与产业合作，从而在“石油美元”体系之外，进一步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技术与资本循环网络。例如，在 2025 年 5 月对海湾三国的访问中，特朗普推动达成了一系列以千亿美元计的投资承诺，以伙伴国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基准，旨在引导地区资本定向投入美国人工智能及相关高科技领域。

第二章

低成本维持霸权与特朗普中东政策领域实践

在本轮美以伊战争爆发之前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低成本维持霸权”的战略已成为其塑造中东地区格局的重要抓手。这一战略影响广泛，集中体现在安全、发展及盟友体系等多个层面。从形式上看，与此前美国追求军事干涉、强调安全投入、维持控制体系的传统路径相比，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呈现出突出和平强调发展推动盟友自主与地区和解等特征。然而，在这些看似积极的政策表象背后，上述举措实质上均沦为服务其低成本维持霸权的主要途径。

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通过构建所谓“以实力谋和平”的体系，在“和平外交”的外衣下标榜不介入大规模军事行动，实则持续强化美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延续其安全霸权。在发展领域，面对阿拉伯国家试图借助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实现经济转型的趋势，美国利用自身技术霸权，不断推动相关国家在技术合作、产业布局和战略选择上服从其“美国优先”议程。在盟友体系层面，特朗普政府借助地区关系“正常化”的背景，持续推动安全责任外包，将更多安全成本转嫁给地区盟友。这一做法虽在短期内降低了美国直接介入的成本，却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安全结构的脆弱性，为新的安全风险埋下隐患。

一、以实力谋调停：和平外交背后的霸权主义逻辑

特朗普 2025 年开启第二任期后，积极推动巴以停火以及和平方案。在避免大规模军事介入、以交易促稳定、以实力塑造和平的思路下，特朗普政府重新将“和

“和平外交”塑造为其中东政策的重要叙事标签。然而，这种和平外交并非以冲突根源治理、制度性公正或多边规范为导向，而是以“美国优先”为导向，通过调停让美国从中获益，在地区事务中减少投入的同时维持美国的地区影响力。³这一做法既回避了传统安全承诺所要求的长期投入与责任承担，又将美国意志嵌入地区秩序调整之中，体现了其霸权维系逻辑。

特朗普政府所理解的和平，本质上是一种以“美国优先”为目标的**消极和平**。在这一逻辑下，冲突并非必须通过政治妥协、公正安排或制度改革加以解决，美国也并不致力于进行冲突解决所需的长期投入，而是希望**通过力量不对称、外部压制与既成事实来“冻结”冲突**。因此，特朗普在中东问题上反复强调实力带来尊重、强者才能促成和平，并将军事威慑、经济制裁和外交偏袒视为调停进程中的核心杠杆。这一点在特朗普调停巴以问题时尤为明显。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续并强化了其第一任期“交易式和平”的基本思路。⁴**美国不再将“两国方案”作为不可动摇的目标，而是将地区稳定、以色列安全以及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置于更高优先级**。在此背景下，巴勒斯坦问题被进一步边缘化，其地位从中东和平进程的核心议题，降格为地区秩序重构中的“附属变量”。特朗普政府通过对以色列的高度政治与军事支持，为其在领土、安全和定居点问题上的强硬政策提供了外部背书。与此同时，美国对巴勒斯坦方面的政治压力和经济约束持续加码，试图迫使其接受既成事实。这种做法在短期内确实有助于压低冲突烈度，但也系统性地侵蚀了巴勒斯坦的政治主体性，使所谓“和平”建立在权利让渡和不对等谈判之上，进一步加深了冲突的结构性根源。2026年初，特朗普宣布成立所谓加沙问题“和平委员会”，弱化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建国诉求，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

在叙利亚问题上，特朗普上台后采取观望立场。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不愿意卷

3 王震：《从“全球反恐”到“大国竞争”：特朗普与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的中东战略第二次转型》，载《西亚非洲》，2025年第6期，第57页。

4 范鸿：《“接管”加沙：特朗普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创举？》，载《世界知识》，2025年第5期，第45-47页。

人到叙利亚变局之中并为之付出额外消耗。叙利亚变局发生后，美国对其在叙利亚的传统盟友（如库尔德武装等）的支持和扶持力度并未上升，也没有实施相关举措帮助美国扶持的盟友夺取叙利亚权力。另一方面，特朗普一改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艾哈迈德·沙拉所领导武装的敌视态度，在其执掌政权后观望并私下接触，与之建立联系。此外，特朗普还以政权承认为筹码换取了沙拉政府在反恐问题上对美国的保证。⁵

在黎巴嫩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将“防止地区冲突升级”和“遏制敌对势力扩散”作为主要目标，通过制裁、援助筛选和外交施压影响黎巴嫩政治生态，却对黎巴嫩国内深层次政治与经济危机缺乏系统回应，也未致力于推动其脆弱的教派政治结构改革。尽管黎巴嫩被视为地区博弈的缓冲地带，但美国把黎巴嫩的和平理解为“不爆发全面冲突”，而非国家治理能力的恢复或社会契约的重建。

这种实力主导的调停方式往往牺牲冲突各方中相对弱势群体的政治权利，导致和平进程在规范层面严重失衡。这些方案存在严重不公平性，以牺牲冲突方弱势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和平重建。这种“以实力求和平、以和平废公正”的调停悖论，使美国在中东的和平角色更多表现为秩序管理者而非冲突解决者，也为地区长期稳定埋下了新的结构性隐患。

二、以技术换服从：技术合作背后的霸权主义逻辑

特朗普的中东发展议程紧密围绕美国国内经济利益、美元霸权延续以及总统个人政治与商业收益展开。这一议程在表面上强调经济发展与合作，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将发展合作与霸权压迫、经济共赢与私人利益勾兑紧密结合，体现出一种高度功利化、短期化的中东发展路径。

冷战以来，“石油美元体系”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维持金融与地缘政治主导

⁵ Steven A. Cook, “Pivotal U.S. Summit Could Help Mend a Fractured Syri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6, 2025, <https://www.cfr.org/expert-brief/pivotal-us-summit-could-help-mend-fractured-syria>.

地位的核心支柱。通过推动中东主要产油国以美元结算石油贸易，美国不仅稳固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也借此实现了对全球能源与金融体系的结构控制。然而，在页岩油革命削弱美国对中东能源依赖、全球能源转型加速以及数字金融兴起的背景下，传统石油美元体系面临挑战。特朗普政府并未尝试修复这一旧有体系，而是推动将数字经济与新技术嵌入中东发展议程之中，试图塑造新的格局。特朗普时期，美国在中东的经济合作重点明显向高科技、人工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转移。一方面，美国鼓励海湾国家加大对人工智能、云计算、智慧城市和金融科技的投资，通过美国科技公司主导相关技术标准与平台建设；⁶ 另一方面，美国通过限制中东国家与中国和俄罗斯在 5G、数字支付等领域的合作，试图确保新一轮技术与金融体系仍以美国为核心。这种做法在本质上是将石油美元的逻辑移植到数字经济领域，构建以技术美元和数据美元为支点的新型霸权结构。在数字货币与金融科技领域，特朗普政府虽对去中心化加密货币保持警惕，但并不排斥由美国资本和金融机构主导的数字金融创新。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和大型金融机构被视为这一体系的重要资金来源和试验场。通过引导中东资本进入美国主导的金融科技项目，美国不仅吸纳了地区剩余资本，也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对未来金融规则的控制。这种以“创新”和“发展”为名的经济议程，实质上服务于美元霸权的延续与升级。

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反复强调发展、繁荣和经济机会，但其发展合作与苛刻的政治条件和战略压迫并行推进，是美国施压、胁迫地区国家并重塑地区秩序的工具。在对伊朗的政策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特朗普政府一方面通过极限施压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严重破坏其经济发展与民生基础；另一方面又以“如果伊朗改变行为，美国将带来投资和发展”为条件，试图将经济发展塑造成政治服从的奖励机制。这种做法不仅削弱了发展合作的正当性，也加剧了地区国家对美国“发展承诺”的不信任。在海湾地区，美国同样将发展合作与安全依附捆绑在一起。特朗普政府鼓励沙特、阿联酋等国推进经济多元化和现代化改革，但前提是持续高额采购美国

⁶ Pablo Chavez, "U.S. AI Statecraft: From Gulf Deals to an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October 2025, <https://doi.org/10.51593/20250019>.

武器、支持美国在地区的战略部署，并在关键外交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⁷ 这种投资换庇护的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不对称的霸权交易：中东国家获得有限的发展空间，却必须承担高昂的政治与战略成本。此外，美国在推动所谓“中东和平与繁荣”的过程中，也将经济发展工具化。该计划试图以经济投资替代政治权利和国家主权问题，通过承诺经济增长来弱化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核心。这一发展叙事忽视了结构性不平等和政治压迫的根源，强化了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秩序中的支配地位。

特朗普中东发展议程最具争议之处，在于公共政策目标与私人商业利益之间的高度交织。特朗普几乎毫不掩饰其将国家政策与个人及家族商业利益相结合的倾向，而中东正是这一倾向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在经济合作层面，特朗普频繁将中东国家的投资、军售合同和基础设施项目包装为“美国就业”和“经济胜利”的象征。这种叙事在美国国内政治上具有动员意义，但在实践中却模糊了国家利益与私人收益的界限。⁸ 多项中东投资项目、地产合作和金融往来，被媒体和学界质疑与特朗普家族商业网络存在潜在关联，使中东发展议程呈现出明显的“私人化”特征。更重要的是，这种私人利益勾兑改变了美国发展政策的运作逻辑。发展合作不再围绕长期稳定、制度建设或社会包容，而是更关注短期资本回报和政治表演效果。这不仅削弱了美国政策的可持续性，也进一步侵蚀了其在中东地区的“道义信誉”。对于中东国家而言，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合作虽可能带来短期收益，却也伴随着高度不确定性。一旦美国国内政治发生变化，或总统个人利益不再相关，这些合作关系便可能迅速瓦解。

特朗普的中东发展议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发展战略，而是一种以霸权维护为核心、以经济工具为手段、以个人政治与商业利益为重要驱动因素的复合型议程。通过推动“石油美元”的数字化转型，美国试图在新技术领域延续其结构性优势；通

7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Secures Historic \$600 Billion Investment Commitment in Saudi Arabia,” May 13,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5/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secures-historic-600-billion-investment-commitment-in-saudi-arabia>.

8 Allison McManus, “Trump’s Gulf Interests Conflict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May 20, 2025,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trumps-gulf-interests-conflict-with-the-interests-of-the-american-people>.

过将发展合作与政治压迫相结合，美国强化了对地区国家的控制；通过将经济共赢与私人利益勾兑，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发展政策的公共性与规范性。这一议程不仅未能为中东地区带来可持续发展，反而加深了地区对外部干预的依赖与结构性脆弱，也为后续美国中东政策留下了复杂而矛盾的遗产。

三、以盟友整合换取责任外包：《亚伯拉罕协议》2.0 背后的霸权主义逻辑

在 2025 年重返白宫后，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外交层面进一步强化了“盟友整合—责任外包—代理稳定”的政策路径。这一路径并非以多边安全机制或区域合作制度为基础，而是致力于整合亲美国国家、强化阵营边界、推动盟友承担更多安全与治理成本，从而在实现“美国优先”的同时降低在地区的投入。在这一框架下，《亚伯拉罕协议》的功能定位发生了重要转变，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逐步从传统安全保护演变为更具代理性质的秩序协作。

特朗普第一任期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在形式上标志着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突破，在其第二任期内，该协议的政治功能被进一步重塑和扩展。2025 年后的特朗普政府不再将其仅视为双边或多边外交成果，而是将其制度化为地区阵营整合的重要工具，用以构建以以色列为技术与安全支点、以阿拉伯盟友为政治与经济支撑的区域合作网络。⁹ 在这一过程中，《亚伯拉罕协议》逐渐脱离传统和平进程的逻辑，不再以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作为前提条件，而是被嵌入更广泛的地缘战略考量之中。通过强化经济互联、情报合作与防务协调，美国推动相关国家在事实上形成“非正式联盟”，以应对地区内被界定为“共同威胁”的行为体。这种做法强行压制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传统矛盾，并将其聚集在美国的大战略之下，意图用美国的霸权维系中东的和平。

⁹ Brian Katulis, “US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Third Quarter 2025 Report Card,” Middle East Institute, October 27, 2025, <https://mei.edu/publications/us-policy-middle-east-third-quarter-2025-report-card>.

值得注意的是，《亚伯拉罕协议》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扩展，并未伴随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性回应。相反，协议的制度化运作在客观上削弱了巴勒斯坦在地区外交议程中的议题中心地位。美国通过推动阿拉伯国家将国家利益优先于泛阿拉伯政治诉求，使巴勒斯坦问题被重新界定为“可被管理的长期矛盾”，而非必须解决的结构性不公。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中东和平进程的议题排序，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区域外交的根本取向：和平不再意味着权利平衡与政治正义，而是通过联盟整合实现秩序可控。由此，《亚伯拉罕协议》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去政治化”的和平工具，其功能在于维护短期地区稳定而非根本性解决地区矛盾。

在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上，特朗普政府在 2025 年后明显加快了“责任转移”和“代理稳定”的进程，要求海湾盟友在地区安全、能源秩序和冲突管理中承担更大责任，以换取美国在政治和军事层面的支持。这一关系重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美国通过军售、技术合作与情报共享，提升海湾国家的自主防卫和区域干预能力，使其在局部冲突中扮演更积极的秩序维护者角色；其二，在不触及美国核心战略底线的前提下，美国在外交上给予这些国家更大的政策空间，容忍其在地区事务中的自主行动；其三，特朗普政府将经济合作、能源协调与安全议题高度捆绑，使盟友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交易化特征。

然而，这种以盟友整合和代理体系为核心的区域外交，也蕴含着显著的结构风险。一方面，代理稳定模式可能放大地区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安全困境，使局部冲突更易被区域力量主导并升级。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减少直接介入而保持影响力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对盟友行为的约束能力，反而增加了地区不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体系在规范层面缺乏对政治包容、社会重建与制度改革关注，使区域稳定高度依赖权力均衡与威慑逻辑。一旦代理国家内部出现治理危机或战略误判，所谓“稳定”便可能迅速转化为新的冲突源。

总体来看，特朗普 2025 年后的区域外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多边合作或集体安全建设，而是一种以盟友整合和代理体系为核心的秩序管

理模式。《亚伯拉罕协议》的制度化延伸以及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代理化重构，体现了美国在中东“降本维稳”的战略选择，但也在长期层面加剧了地区政治的阵营对立与和平的脆弱性。

第三章

低成本维持霸权下美国中东布局

在此轮美以伊战争之前,美国为推动低成本维持霸权的战略思路,针对中东地区不同势力采取了差异化的布局模式。一方面,为维系低成本霸权的威慑逻辑、塑造地区盟友整合所需的“假想敌”,特朗普对伊朗持续施压,秉持以打促谈的策略,将伊朗塑造为地区首要威胁。另一方面,为强化低成本霸权的威慑能力,美国在安全领域进一步加强与以色列的合作,并对以色列的安全冒险行为采取实质上的纵容立场。然而,在这种看似亲密无间的美以合作中,美国受以色列安全冒进与霸权扩张所牵连的风险也在逐步增大。同时,为推动地区国家分担霸权成本并收割低成本霸权红利,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加强了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从形式上看,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战略互惠——美国在获得新一轮海湾资本支持的同时,将先进技术扩散至海湾国家。但就其本质而言,这种合作更多体现为一种相互算计:试图从中东收缩的霸权国与自主性日益增强的地区国家之间的博弈与交易。最后,在特朗普低成本霸权布局中,土耳其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位,双方在维持关系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相互利用,谋求战术层面的合作。这一系列地区布局虽提升美国的短期影响力,但却对中东和平秩序带来深远影响。巴勒斯坦问题、伊朗核问题等涉及地区长期稳定与公平治理的核心议题仍陷于停滞,美国主导的议程设置日益显露出其选择性与工具性特征。从长远视角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在中东相对实力下滑、地区国家寻求战略自主的结构性态势。

一、伊朗：低成本霸权下假想敌与目标

伊朗是美国低成本霸权框架下的主要假想敌，也是维系其霸权合法性的根源所在。从维持低成本霸权的角度审视，伊朗对于美国具有两重战略意义。

其一，作为维系美国霸权存在的所谓“合法性”根源。1991年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霸权的主要合法性来源于“西促和平、东遏两伊”，即同时垄断推动地区和平进程以及遏制所谓地区威胁这两类安全产品的供给。而当前，由于低成本霸权的内在需要，美国既不愿有力推动巴以和平进程，更不愿持续投入伊拉克国家建设，因此亟需维持伊朗威胁的存在，并将所谓伊朗核威胁夸大为地区核心安全挑战，进而为其霸权存在提供合法性支撑。

其二，夸大伊朗威胁亦契合美国将霸权维持成本向地区国家转嫁的诉求。由于伊朗威胁高度契合以色列的安全关切，以色列因而具有更强意愿参与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与此同时，近年来美国以“亚伯拉罕协议”推动地区国家关系正常化，其主要内在逻辑亦在于以伊朗威胁挤压巴勒斯坦问题的议程优先度，将伊朗塑造为地区首要威胁，从而团结海湾阿拉伯国家并推动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当前，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形成相互封锁态势，战争风险持续维持高位。但这一行为本质上仍是美国低成本霸权框架下对伊朗战略的具体呈现。即使在此轮美国全面对伊动武之前，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强硬政策已呈现“施压—抵抗—僵持”的循环特征。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在于：在控制总体成本的前提下，综合运用经济极限施压、军事威慑与打击及外交孤立等手段，将伊朗逐出地区权力博弈的核心圈层，迫使其走向边缘化，并最终推动其接受一项符合美国利益的新核协议。

特朗普对伊朗的系列行动虽在战术层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并未实现根本性的战略目标。伊朗的地区影响力网络虽受挤压但未被根除，极限施压反使伊朗展现超预期韧性。**首先**，从经济层面看，特朗普政府自第一任期起就对伊朗实施“极限

施压”，试图通过严厉制裁切断其与国际经济的联系，导致伊朗陷入严重通胀与经济困难。然而，高压之下伊朗逐步构建起以内循环为主的“抵抗经济”，¹⁰在基础工业、日用品等领域实现较高程度自给，并在生物医药、军工等关键行业取得局部突破。同时，伊朗积极拓展与非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¹¹其石油出口已从制裁低谷中逐步恢复。这些调整使伊朗经济虽受冲击却未崩溃，保持了与美国长期周旋的基本能力。

其次，在军事层面，特朗普政府虽未计划对伊朗发动全面入侵，但其采取的机会主义干预策略（包括借助以色列实施军事打击及自身有限介入）旨在利用伊朗内部矛盾，试图通过外部施压引发政权动荡甚至崩溃。例如在“12日战争”和此轮美以伊期间，以色列曾直接向伊朗民众进行舆论呼吁，流亡的前巴列维政权势力也试图借机活动。¹²然而实际结果表明，外部军事压力反而强化了伊朗国内的“聚旗效应”，暂时缓解了内部社会矛盾。尽管战争初期伊朗指挥体系遭受重创，但其在战争中后期逐步组织有效反击，最终在战场上扳回一定主动权。

最后，从外交层面审视，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对伊朗的强硬政策迫使其陷入孤立，然而实际效果却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伊朗明确了外交方向、拓宽了战略空间。一方面，美国过度倚重以色列对伊朗施压，在造成伊朗损害的同时也加剧了地区国家对以色列强势扩张的忧虑，客观上为伊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缓和创造了条件。在近年的地区冲突中，沙特等国曾多次在外交场合批评以色列并表达对伊朗的声援。另一方面，持续的外部压力促使伊朗内部在外交路线上达成更清晰的共识，加速其“向东看”战略转向，¹³深化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战略协作。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微妙变化：与2015年相比，当前中俄等国在核议题上与伊朗的协调更为紧密，伊朗坚持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获得更多理解。特朗普

10 牛新春：《伊朗面临新的战略选择》，载《世界知识》，2024年第24期，第62-63页。

11 Sara Bazoobandi and Olena Osypenkova, “Expansion of the Russo-Iranian Nexus,” GIGA Focus,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GIGA), July 2024, <https://www.giga-hamburg.de/en/publications/giga-focus/expansion-of-the-russo-iranian-nexus>.

12 Robert Tait, “Son of former shah says he i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lead Iran as he predicts end of regime,” The Guardian, January 16, 202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6/jan/16/son-of-former-iranian-monarch-calls-for-targeted-intervention-to-hasten-regimes-collapse>.

13 Akbarzadeh Shahram, “Can Multipolar Blocs Offer Iran a Way Out of Isolation?” Middle East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11 December 2025, <https://mecouncil.org/publication/can-multipolar-blocs-offer-iran-a-way-out-of-isolation/>.

以压力促妥协的策略，反而强化了伊朗的抗压韧性，并使其在国际博弈中构筑了更明确的外交阵线。

二、以色列：低成本霸权下安全打手

为了维持低成本霸权，美国需要减少地区军事行动同时，维持其威慑。而以色列则可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抓手。一方面，在中东地区而言，以色列属于具有较高战斗力的军事体系，并且该体系对于美国依赖较深，因此也与美军具有较高的协调与联动基础。另一方面，以色列长期以来追求对伊朗遏制政策，并且在2023年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采取了追求绝对安全的军事扩张政策以上两方面使以色列同时具备了分担美国安全霸权，进行地区军事冒险威慑的动机与能力。而特朗普也通过与以色列合作，在放任以色列基础上维持地区低成本霸权的安全能力。

长期以来，特朗普政府与以色列形成了高度紧密的战略互动。特朗普自称“美国史上最亲以色列的总统”，内塔尼亚胡也称其为“以色列最好的朋友”。¹⁴在政策层面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即推动美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主权并退出伊核协议；第二任期更转为明显偏袒，不仅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还在相关停火协议中主张排除乃至消灭哈马斯，为以方军事冒险提供外交掩护。然而，这种一边倒的支持政策也潜藏着多重风险，可能在未来引发地区反弹、盟友关系失衡乃至美国自身战略信誉受损等反噬效应。

首先，特朗普政府与以色列深度绑定，必然引发其中东整体布局的矛盾。美国当前中东战略的核心目标是整合盟友体系，而扩大《亚伯拉罕协议》是其关键抓手。然而，过度纵容以色列坐大，只会加剧地区国家对以色列的担忧。一个明显例证是：特朗普第一任期达成的《亚伯拉罕协议》，开创了绕开巴勒斯坦问题推动阿以关系正常化的先例。但到了第二任期，尽管沙特对与以色列建交表示出了兴趣，却明确

¹⁴ Netanyahu Benjamin, "Netanyahu hails Trump as 'Israel's greatest friend'," Anadolu Agency, 13 October 2025, <https://www.aa.com.tr/en/middle-east/netanyahu-hails-trump-as-israel-s-greatest-friend-/3715861>.

将落实巴勒斯坦“两国方案”作为核心前提。更严重的是，当以色列的军事冒险行为扩大到袭击美国在该地区的阿拉伯盟友（如 2025 年 9 月 9 日袭击卡塔尔）时，美国面临双重压力：既要维系与以色列的传统友谊，又要安抚海湾阿拉伯盟友。这迫使美国不得不更多约束以色列，甚至公开表明立场分歧。例如，卡塔尔遇袭后，美国在海湾的安全承诺信誉遭受重创，不得不施压内塔尼亚胡政府向卡塔尔道歉以缓和矛盾。¹⁵

其次，特朗普政府与内塔尼亚胡的紧密关系，正撕裂其民粹主义基本盘。尽管特朗普顶层战略是要将美以深度绑定，其核心票仓“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内部却因反干涉与反建制情绪交织，正催生显著裂痕。一股反以色列暗流正从边缘涌向主流，实质性冲击共和党传统的“亲以共识”。这股力量包含三部分势力：一是以塔克·卡尔森及其拥趸为代表本土优先派，奉行经济零和逻辑，反对资源外流；二是以“Groyper”运动等为代表的激进右翼新生代，视“犹太复国主义”为侵蚀美国意志的外力，将特朗普小圈子内亲以顾问（如库什纳）斥为 MAGA¹⁶ 纯洁性的“叛徒”，高喊“美国优先绝非以色列优先”以切割美以关系；三是地缘现实派，反对林赛·格雷厄姆等建制鹰派，视以色列为外交“战略负资产”，主张减少干涉规避霸权透支。尽管这些势力目前在共和党内仍属极端，长远看却可能从根本上动摇美国支持以色列的逻辑根基。如美国副总统万斯就明确暗示其对以色列的不满。¹⁷

美国与以色列关于加沙未来治理模式将会出现更多分歧。特朗普政府基于“美国优先”的成本核算逻辑，极力推销由区域盟友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及多国参与的“国际稳定部队”方案，其核心意图在于通过外交责任“外包”来实现低成本“维

15 Qata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srael apologizes for its attack on Qatar during a call between the US President, the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September 29, 2025, <https://mofa.gov.qa/en/qatar/latest-articles/latest-news/details/2025/09/29/israel-apologizes-for-its-attack-on-qatar-during-a-call-between-the-us-president-the-prime-minister-and-minister-of-foreign-affairs--and-the-israeli-prime-minister>.

16 Ben Lorber, “Nick Fuentes Has Officially Breached the MAGA Gates,” The Nation, November 4, 2025,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politics/nick-fuentes-carlson-israel-maga/>.

17 Al Jazeera, “Vance criticises Israeli parliament vote on West Bank annexation,” October 23, 2025,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5/10/23/vance-criticises-israeli-parliament-vote-on-west-bank-annexation>.

稳”与自身战略抽身，避免美国再次陷入中东的泥潭。然而，这一构想与以色列右翼政府的根本战略诉求构成了深层互斥。以色列坚持对加沙地带保留“排他性的安全覆盖权”与行动自由，视任何形式的实质性国际介入为对其主权意志的潜在束缚，更担忧此类多边监管机制最终演变为限制以军反恐行动或强推“两国方案”的政治杠杆。届时，特朗普作为“交易型调停者”急于达成外交政绩的功利主义，将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基于生存焦虑而追求“绝对安全”的长期主义发生正面碰撞，双方围绕战后加沙主导权的博弈，极可能超越单纯的军事协同，爆发更多的冲突。

特朗普政府还需平衡对海湾阿拉伯盟友的军事合作与维持以色列军事优势之间的张力，这正成为美以关系的新摩擦点。随着华盛顿与海湾国家（尤其是沙特）在特朗普任内加速重建战略互信，美国试图在巩固美以传统同盟与拓展阿拉伯伙伴网络间寻求平衡，但这必然触及以色列的核心安全神经。以沙特王储 2025 年访美敲定 F-35 采购意向为例，¹⁸ 此举虽高度契合特朗普“军售换就业”的经济逻辑，却在以色列引发战略焦虑与激烈反弹，以色列国防机构将此类五代机向阿拉伯世界扩散视为对其区域制空垄断地位的实质性削弱。这种追求绝对安全优势的零和思维，与特朗普政府推动的、通过武装盟友分担防务成本的商业实用主义逻辑尖锐对立。未来围绕 F-35 交付技术限制及补偿性援助的博弈，将超越技术层面，深刻折射美以关系底层逻辑的转变：以色列不得不面对一个战略现实，即在美国全球收缩与中东再平衡背景下，其作为美国在中东“唯一且排他”的特殊盟友地位，正逐渐让位于基于现实利益交换的多边平衡。

三、海湾阿拉伯国家：低成本霸权之下经济回报提供方

海湾阿拉伯国家是美国低成本霸权在地区维系的另一重要支点。如果说以色列

¹⁸ Corey Walker, “Trump Says US Will Sell F-35s to Saudi Arabia Ahead of White House Talks With Crown Prince,” Algemeiner.com, November 17, 2025, <https://www.algemeiner.com/2025/11/17/trump-says-us-sell-f-35s-saudi-arabia-ahead-white-house-talks-crown-prince>.

构成美国低成本霸权体系的安全支撑，那么海湾阿拉伯国家则是这一体系的经济支撑。这种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其一，海湾阿拉伯国家通过大规模持续投资美国、引进美国科技，在后石油美元时代将自身财富的依托从美国金融产品转向对美国的技术依赖；
- 其二，海湾国家通过在经济领域深度投资美国，实际上将自身未来经济发展所需的科技基础再次与美国霸权绑定。在此轮美以伊冲突爆发前，海湾地区被视为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更一度提出了所谓“人工智能全球第三极”的设想。而伴随美国高调加强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技术合作，其在看似降低对地区军事干涉的同时，本质上是试图将此前以军事介入为主导的安全霸权升级为以技术依赖为核心的技术霸权，即维持海湾阿拉伯国家在经济转型进程中对美国技术的深度依赖，从而在以经济手段维持霸权低成本运行的同时，攫取相应的战略收益。

从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来看，特朗普中东政策取得了相对显著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 一是美国在减少直接军事介入的同时，通过以色列有效维持了地区威慑，持续强化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的安全依赖。在《亚伯拉罕协议》后，美国将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军事力量进一步整合，以美国中央司令部为枢纽建立了中东的安全协调机制，该机制在 2024 年应对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其他领域，海湾国家与以色列在科技合作、防务演练、情报共享等领域都展开了

合作与协调，双方在安全层面的联系进一步加深。

- 二是实现了在中东地区地缘经济上的突破。自第二任期伊始，特朗普加强了美国与中东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美国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海湾三国围绕人工智能领域展开深度协同，构建起涵盖技术输出、基建共建、资本联动的全方位合作生态。美方撤销此前 AI 芯片出口限制，批准向三国出口英伟达 GB300、H100 等先进处理器，助力沙特 Humain 公司与 xAI、英伟达共建 500 兆瓦巨型数据中心，推动阿联酋 G42 集团联合 OpenAI 等美企打造阿布扎比 5 吉瓦 AI 园区。卡塔尔则通过主权财富基金战略投资美国 Anthropic 等 AI 企业。这些合作以“技术—资本—能源”互补为核心，既支撑海湾三国经济多元化转型，更通过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 AI 技术标准与数字生态，深化双方在高科技领域的战略绑定。
- 三是在软实力层面获得一定加分，塑造和平缔造者的形象。特朗普再次主政后，虽然并没有改变对以色列的偏袒政策，但凭借其相对强势的外交姿态进而压迫以色列达成加沙停火，2025 年 10 月 13 日，特朗普与埃及总统塞西共同主持召开沙姆沙伊赫和平峰会，20 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参会，美国、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四国元首以担保方身份签署加沙停火协议。同时，设立由特朗普任主席的“和平委员会”监督过渡治理，规划加沙重建与经济区建设。加沙停火以及埃及和平峰会的召开在客观上提升了特朗普所谓基于实力的和平的可信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美国软实力。

无疑，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举措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地区国家与美国的联结和绑定。然而，地区国家对美国并非无条件追随和顺从，而是基于自身战略需求，根据不同战略目标进行不同程度的主动决策。

首先，美国通过以色列维持安全威慑，并未打断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2023年后，以伊冲突加剧导致伊朗势力收缩、以色列坐大，形成“以强伊弱”局面，迫使海湾国家再次权衡。突出表现是沙特与伊朗2023年达成的和解在地区冲突中总体层面得到维持，即便在美以伊战争背景下，海合会国家也并未与伊朗爆发如23年和解之前的直接武装对抗。而美国虽然力推亚伯拉罕协议能够从阿联酋、巴林等国扩大到沙特，但由于巴勒斯坦问题，沙特等地区国家始终不愿轻易同意美国让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请求。此轮美以伊战争爆发后，海湾阿拉伯国家中一度出现参与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势头，其与伊朗之间的敌意也显著上升，但整体上仍维持住了不与伊朗发生全面冲突的底线。不仅如此，沙特等国更积极参与到当前对伊朗的斡旋之中，甚至提出希望与伊朗达成互不侵犯条约。

其次，美国在中东的经济投入，客观上与地区国家谋求产业自主的诉求存在交集，形成某种程度的相互利用，因此其在维持美国低成本霸权同时，也是在推动地区国家在经济上采取更自主的行为。海湾国家面对美国承诺的不确定性，“向东看”与追求多元化成为主流。近年来，伴随经济转型，海合会国家将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视为重点，而美国在基础算法和芯片等关键环节占据优势，这促使海湾国家寻求与美科技合作，既为自身产业与技术升级，也为对美示好。

第三，在低成本霸权基本情况下，地区阿拉伯国家整体上对于美国安全承诺信任度在降低。海湾阿拉伯国家目前持续维持对美国的依赖，本质上是缺乏有效替代方案的无奈选择。在巴以问题上，地区国家对以色列的激进行动普遍不满，对特朗普的加沙停火计划也疑虑重重。尤其在国际稳定部队问题上，沙特、阿联酋等国明确拒绝派兵，且该部队未来如何处理与 Hamas 及以色列的关系，会否如黎巴嫩维和部队般沦为袭击目标，都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中东格局也决定了唯有美国具备实际约束以色列的能力。冷战结束后，美国借海湾战争的契机在波斯湾建立了数十个军事基地，确立了主导地位，至今仍维持约3万驻军。尽管美国国力相对下降且不愿卷入新冲突，但只要这些军事力量存在，就保有显著的存量军事与战略优势。而其

他域外大国或无意、或无力在波斯湾与美国展开战略竞争：俄罗斯战略重心深陷乌克兰，2024年12月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后更失去了中东支点；欧洲有意介入但实力不足且缺乏统一机制。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新一轮升温看似“双向奔赴”，实则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因弱势地位展现出更多主动，关键原因在于缺乏能挑战美国的域外竞争者。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海湾国家被迫继续寻求美国支持。而这一张力不仅难以被低成本霸权战略所化解，甚至还将持续发酵。正如此轮美以伊战争所示，沙特、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被卷入冲突，其发展前景遭受重创，这促使其进一步认识到美国在地区的安全存在非但不能成为保护其发展的屏障，反而构成其发展的阻碍与风险。

四、土耳其：低成本维持霸权中的边缘变量

在目前特朗普外交政策中，土耳其在维持其在中东格局中作用处于相对边缘化地位。因此其更多着眼于稳定与土耳其关系，避免土耳其与以色列等关系的严重恶化，采取了战术合作以及相互利用的特征。作为极少数有意愿、也有能力充当地区责任承接者的大国，土耳其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受到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美认为土是唯一同时具备北约成员国、中等强国地位并日益具有全球行为体特征（increasing global player）独特身份的国家。美在加沙问题、叙利亚问题等地区议题以及大国战略竞争等全球热点问题上对土倚重增加，而土因经济压力、国防合作需求以及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寻求美支持等因素也积极主动向美靠近。例如，根据近期彭博社报道，土向俄提出希望俄收回此前出售给土耳其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被广泛解读为土意图修复与美国的关系，主动寻求新的谈判空间。

同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其个人化外交风格也成为与土耳其关系改善的原因。土耳其外长声称“在通话中特朗普对埃尔多安表现出了明显的尊重”。¹⁹ 美驻

¹⁹ Servet Günerigök, “Trump Calls Turkish President Erdogan ‘Friend,’ Says He Respects Him,” Anadolu Agency, January 7, 2025, <https://www.aa.com.tr/en/americas/trump-calls-turkish-president-erdogan-friend-says-he-respects-him/3444198>.

土大使汤姆·巴拉克称两人私人关系“像兄弟一样”，这是美土关系的核心。²⁰而特朗普奉行“去意识形态”的务实政策，不再批评埃政府不民主，也为双边关系推进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尽管短期内“特埃”个人私交与双方的战术需求掩盖了分歧，但从长远来看，美土关系仍受制于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地缘战略的根本错位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机制的牵制。这种基于“交易主义”的关系本质脆弱，一旦利益交换失衡，双边关系极易再次陷入动荡。

首先，核心地缘安全利益的“结构性死结”难以解开，尤其是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美国军方与建制派长期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SDF/YPG)为反恐的最有效盟友，而安卡拉视其为库尔德工人党(PKK)的分支及首要国家安全威胁。尽管特朗普倾向于撤军，但五角大楼与国会的阻力巨大。一旦美国在叙利亚保留哪怕极小规模军事存在或继续向库尔德人提供政治支持，都将触动土耳其的敏感神经。这种根本性的安全认知差异，无法仅靠两国领导人的通话或个人私交消除。

其次，中东区域政策的严重对立，特别是在以色列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基石是绝对支持以色列，并推动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以关系正常化。而埃尔多安政府长期以“伊斯兰世界代言人”自居，在加沙问题上立场强硬，甚至公开支持哈马斯，称以色列为“恐怖主义国家”。这种意识形态与地区角色的剧烈冲突，注定美土在巴以问题上难有共识。当加沙或黎巴嫩局势升级时，埃尔多安的国内政治需求将迫使其采取反美、反以立场，从而冲击脆弱的美土互信。

再次，土耳其的“战略自主”倾向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错位。尽管土耳其试图通过处理S-400问题向美示好，但其追求独立大国地位的长期目标未变。在俄乌冲突中，土耳其坚持保持平衡，拒绝完全加入西方对俄制裁；在对华关系上，土耳其也寻求经济合作而非对抗。美国要求盟友在处理与中、俄关系的问题上“选

20 Turkish Minute, “Trump-Erdoğan ‘Bromance’ a ‘Great Thing,’ Turkey-Israel Ties Will Get Better: US Ambassador,” December 5, 2025, <https://turkishminute.com/2025/12/05/trump-erdogan-bromance-a-great-thing-turkey-israel-ties-will-get-better-us-ambassador/>.

边站”，而土耳其则致力于成为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这种战略取向的差异意味着土耳其无法成为美国在这一地区完全顺从的“代理人”。

最后，美国国内政治与司法体系的“硬约束”。即便特朗普本人对埃尔多安友好，但美国国会两党对土耳其的负面看法根深蒂固，且这种情绪常转化为立法行动（如军售限制）。此外，土耳其人民银行（Halkbank）“涉嫌”协助伊朗逃避制裁的案件仍在美司法程序中，这是悬在双边关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特朗普虽能施加行政影响，但无法完全通过行政命令干预司法独立，这一潜在的爆点随时可能被引燃。

综上所述，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土关系虽有回暖，但本质上是一种缺乏共同价值观支撑的“互利共生”。一旦具体的战术利益交换完成，或者一方触碰了对方的核心底线（如库尔德问题或以色列问题），这种基于个人私交的脆弱平衡便可能迅速打破，重演上一任期内“推特外交”引发的过山车式震荡。

第四章

美以伊战争与低成本维持霸权范式的终结

2026

年 2 月 28 日爆发的美以伊直接军事冲突,构成了检验特朗普政府中东“低成本维持霸权”模式的关键节点。伊拉克战争以来,主流分析普遍认为,美国正从中东逐步收缩战略存在。特朗普对高成本军事介入的公开排斥及其反复强调的“对和平的执着”,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判断。然而,美以伊战争集中暴露这一模式的内在局限性:安全供给与和平需求和挑战的错配;解决问题与制造问题的悖论。一方面,美国希望将地区安全委托给代理行为体、自身定位为超然的规则制定者与调停者,但却助长以色列激进冒险主义,最终导致自己不得不亲自下场,另一方面,美国声称要解决伊朗核问题、加沙和平等问题,却正在制造新的地区安全问题。从结构层面看,“低成本维持霸权”逻辑导致两个核心战略误判,误判的后果反过来正导致这一范式的破产。

一、战略误判一

“低成本维持霸权”模式的内在逻辑,驱动华盛顿倾向于选择看似“高收益、低投入”的投机性军事行动。美以联合实施的针对伊朗最高领袖的“斩首打击”,即为这一逻辑的典型产物。其战略预期建立在三重假设之上:**第一**,清除最高领导人将导致精英阶层的恐慌与权力结构瓦解;**第二**,国内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将在外部军事压力下转化为街头反对运动,形成内外夹击态势;**第三**,压倒性空中打击将产生足够的威慑效应,迫使德黑兰迅速接受谈判。这一行动方案之所以被采纳,正是因为它契合了“低成本维持霸权”的核心诉求——以一次精准的外科手术式打击,一举重塑地区力量格局,而无需承担大规模地面战争的成本。

然而，这一投机性判断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严重误判了行动所触碰的底线性质。对一国最高领导人的定点清除，在任何国际政治语境下都构成对国家主权与生存安全的极端威胁，必然触发目标国最大限度的抵抗意志。从目前态势看，上述三重假设均未得到验证，行动不仅未能达成预期的“速决”效果，反而将冲突推向了长期化和高成本化的轨道。

就第一重假设而言，伊朗虽以最高领袖为权力核心，但其政治体制本质上是一套制度化的伊斯兰共和体制，而非依赖单一领袖的个人化权力结构。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他深植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制度网络，现政权已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精英利益共同体，其自身存续与体制存续高度绑定。单一领导人的缺位并不足以瓦解这一群体维护体制的集体行动逻辑。事实上，外部打击反而强化了精英阶层内部的凝聚力——体制的崩溃意味着整个利益集团的覆灭，这一共同认知使得任何内部分裂倾向在生存压力下被迅速压制。

就第二重假设而言，伊朗社会确实存在对经济状况的广泛不满，但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培育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民众对国内治理问题的不满与对外部军事干预的抵制之间存在清晰的心理界限。对国家领导层的外部攻击并未如预期般加剧国内分裂，反而触发了典型的“聚旗效应”（rally-around-the-flag effect），使不同政治立场的群体在国家安全议题上趋于团结。这一反应模式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两伊战争初期伊朗国内同样出现过类似的凝聚效应，表明外部军事威胁往往强化而非削弱目标国的社会动员能力。

就第三重假设而言，威慑理论的基本原理表明，军事压力作为政策工具，其有效性主要体现在遏制对手的机会主义扩张行为上，而对涉及核心国家利益的议题效力有限。有限度的精准打击尚可为外交斡旋保留空间，但针对国家元首的暗杀行动以及对民用设施（如学校）的附带破坏，已将冲突性质从有限的战略博弈推向带有存亡意味的全面对抗。当对手认定自身面临的是生存性威胁而非边际利益损失时，任何理性成本收益计算都将让位于不惜代价的抵抗逻辑，谈判妥协的空间也随之被

实质性压缩乃至消除。

归根结底，投机性军事行动的失败揭示了“低成本维持霸权”模式的一个根本悖论：真正能够以低成本达成的战略目标，往往是有限的、边际性的；而试图以低成本手段实现颠覆性的战略目标——如改变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力结构——则必然触碰对方的核心底线，引发远超预期的反弹与代价。

二、战略误判二

“低成本维持霸权”模式的核心支柱——将安全执行责任外包给地区盟友——在实践中不仅未能降低美国的战略负担，反而导致其同时陷入两重同盟管理危机。

一方面，被以色列的行动逻辑所牵连，卷入超出预期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在战争中切实感受到美国安全保障能力的局限，对美国地区领导力的信任遭受根本性冲击，《亚伯拉罕协议》所设想的自维持安全架构面临根基性动摇。

就以色列方向而言，当前局势的演进呈现出典型的“同盟牵连”（alliance entrapment）特征。在同盟政治的历史经验中，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的中东外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对比参照：基辛格在维持对以色列安全承诺的同时，保留了足够的政策自主性和对盟友的约束杠杆，最终促成了与埃及的和平进程。然而，在当前框架下，美国通过将地区安全秩序的执行权实质性让渡给以色列，在客观上削弱了自身对冲突进程的主导能力。外界曾预期，特朗普与以色列领导层之间的密切个人关系能够构成一种非正式的约束机制，限制以色列对“绝对安全”目标的单边追求。事实上，特朗普在特定节点确实发挥了这一功能——包括促成加沙停火以及在2025年以伊冲突中的调停努力。但正如前政府官员乔·肯特（Joe Kent）在辞职时所指出的，美国在这一进程中最终被盟友的行动逻辑所裹挟，卷入了一场超出其初始战略预期的更广泛冲突。当美国与一个战略目标更为激进——例如追求伊朗政权更迭——的盟友共同深度介入冲突时，双方在退出时机与条件上的分歧将使协调

撤出变得极为困难。这一同盟管理风险并非新的认知：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均刻意将以色列排除在军事联盟之外，其核心考量正是避免因盟友的独立行动逻辑而丧失对冲突进程的控制。特朗普政府在此次冲突中未能有效防范这一风险，使美国进入了升级态势难以预测和管控的局面。

就海湾阿拉伯国家方向而言，“低成本维持霸权”模式面临的挑战更为深层。美以对伊朗发动直接军事打击后，伊朗随即对海湾地区实施报复性攻击，而美国在这一过程中未能有效保护其海湾盟友免受打击。这一事实从根本上动摇了海湾国家长期以来对美国安全保障能力的基本预期。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而言，它们并非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策参与者，却在事实上沦为伊朗报复行动的直接承受者——安全责任外包给以色列的架构设计，使海湾国家被置于一种既无决策权又须承担后果的被动处境。美国未能在冲突中兑现对地区盟友的安全保护承诺，使“低成本维持霸权”模式的信誉基础遭受了直接而具体的损害。

由此，海湾国家陷入了一种双重战略焦虑的困境。一方面，美以军事行动的单边性质以及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对高成本安全承诺的排斥态度，使海湾国家深切担忧美国可能在战事不利或国内政治压力下半途而废——将盟友置于与伊朗直接对抗的险境后抽身离去，重演历史上“用后即弃”的先例。另一方面，即便美国在此次冲突中选择坚持到底，海湾国家也不得不重新审视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障体系所蕴含的结构性风险：这种依赖关系在实践中意味着，海湾国家的安全状态将在很大程度上被美以两国的战略判断与军事冒险所左右，而自身却缺乏对风险来源的有效管控。换言之，无论美国留下还是离开，深度绑定于美国主导的安全架构本身已成为海湾国家安全处境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

这一双重困境正在驱动海湾国家加速推进战略对冲布局。沙特在中国斡旋下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阿联酋在美伊直接冲突中保持审慎距离、海湾国家与中国及俄罗斯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这些动向并非偶然的个案，而是反映了一个系统性趋势：当美国的安全保障在实际冲突考验中暴露出显著局限时，地区盟

友必然启动对自身安全依赖结构的根本性反思，并通过外交多元化来分散风险敞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行为并不意味着海湾国家即刻脱离美国安全轨道，而是反映出一种更为审慎的判断——将国家安全前途单一押注于任何外部大国均存在不可接受的风险，尤其当该大国的地区行为日益呈现出单边性和不可预测性时。

此外，加沙冲突以来美国对以色列军事行动近乎无条件的支持，在阿拉伯世界已引发深层次的政治信任危机。对海湾国家而言，国内公众舆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强烈关切构成了其外交决策的刚性约束。大规模平民伤亡及持续的人道主义灾难，使这些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承受与以色列公开推进关系正常化的代价，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进程实质上已陷入停滞。这意味着“低成本维持霸权”模式的另一根支柱——以阿拉伯－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为基础的地区安全重组——同样面临根基性的松动。

由此，“低成本维持霸权”模式呈现出一种自我瓦解的逻辑：美国越是试图通过责任外包来降低自身投入，就越容易在以色列方向丧失对冲突升级的控制力，同时在海湾方向丧失作为可靠安全提供者的信誉。两重危机相互叠加、彼此强化，使得该模式赖以运转的同盟基础本身面临结构性侵蚀。

第五章

对伊战争后的中东地区秩序展望

中东作为全球能源命脉与关键贸易走廊，历来是大国竞相经略之地。特朗普中东政策欲重塑地区格局，为外部参与带来显著风险与战略挑战，但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带来机遇。

一、中东地区秩序道义根基仍将持续被削弱

特朗普中东政策对中东地区秩序和道义的破坏作用仍将持续。特朗普以“基于实力的和平”及所谓实现“三千年和平”为名，²¹在持续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下推动其中东和平进程，实质是对地区秩序道义根基的严重破坏。

一方面，特朗普中东政策严重损害了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巴以问题实为中东安全的核心，“两国方案”是化解巴以冲突的根本出路。特朗普的所谓“调停”，本质是以此名义推动以色列的单边议程，将短期停火置于巴勒斯坦长期建国进程之上。特朗普政府系统瓦解了国际公认的“土地换和平”法理基石：通过单方面承认耶路撒冷地位、默许定居点合法化及推动《亚伯拉罕协议》，美国构建了“以以制巴”的强权逻辑，也即只要以色列保持压倒性军事优势并获得关键阿拉伯国家承认，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便可被无限期搁置甚至通过经济赎买消解。此做法虽在战术上促成以阿表面和解，却在战略道义上制造巨大断层，向地区传递“实力即正义、既成事实即合法”的危险信号。同时，特朗普的加沙和平协议盲目引入外部维和部队、排斥哈马斯等具有民众基础的巴勒斯坦政治组织，却对建国进程语焉不详，进一步侵蚀了巴以问题的道义基础。

21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Trump is Leading with Peace Through Strength,” March 4,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5/03/president-trump-is-leading-with-peace-through-strength/>.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策导致中东地区道义基础重新被“美式霸权稳定论”主导。美国实际掌控着巴以等地区冲突的停火与和平进程主导权，这不仅使此类议题从关乎正义与民族解放的政治问题，降维为仅需治安管理和经济开发的行政事务。鉴于国际社会目前难以构建替代美国的中东和平治理机制，特朗普“实力即和平”的论调，很可能使过时的霸权稳定理论再度主导中东安全架构，同时使尊重主权、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等创新安全理念沦为空洞口号。这不仅挤压了中国等新兴力量在中东劝和促谈的空间，也削弱了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制对该地区问题的治理权威。总之，特朗普在中东和平问题上最核心的扭曲在于将“实力—交易—站队”置于“规则—权利—公正”之上，弱化了地区秩序赖以自治的正当性来源，通过“以实力求和平”霸权秩序弱化“以公正求和平”的正义秩序。当权利诉求被视为可被绕过，当国际共识与联合国框架被边缘化，地区各方更易得出结论：规则不再是可依赖的公共品，力量才是最终裁决者。其后果是道义共同体的瓦解

二、中东地区秩序的经济合作基础仍将深受美国影响

传统上，中东国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但在经济领域保持了相对灵活的策略，使经济成为其战略自主的重要根基。然而，特朗普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正试图利用美国安全与技术双重优势深度介入中东经济，这一模式实质阻碍了中东国家实现真正自主发展的进程。特朗普的“交易主义”外交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与中东盟友的契约性质，传统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正在演变成为一种基于共同利益之间的交易关系。

特朗普政策将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紧密捆绑的作法将带来深刻经济影响。**其一，在高端军事技术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领域，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将不减反增。**为了获取 F-35 战机、英伟达的高端芯片以及接入美国主导的数字金融体系，沙特、阿联酋等国将不得不支付高昂的“霸权租金”，并在形式上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

其二，随着特朗普政府将中东政策的重心从石油转向“AI 美元”，中东地区

将成为全球科技博弈的前沿阵地。未来几年，美国将极力构建一个排他性的“中东数字生态圈”，通过控制海底光缆、数据中心标准以及芯片供应链，试图将中东国家锁定在美国的技术轨道上，以此来抵消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然而，对于沙特、阿联酋等致力于“后石油时代”转型的国家而言，它们渴望同时吸纳美国的基础算法优势和中国的应用场景与基建能力优势。特朗普的“选边站”压力将与地区国家的“技术自主”诉求发生剧烈碰撞。虽然在短期内，中东国家在核心底层技术（如高端 GPU、操作系统）上向美国妥协，以换取制裁豁免，但在应用层、新能源、5G 通信以及智慧城市建设上，依然会坚持多元化策略。美国试图在中东降下的“数字铁幕”图谋难以真正发挥效果，因为对于中东国家而言，完全的技术附庸不符合其长远的国家生存逻辑。这种围绕技术主权的拉锯战，将成为未来美国与中东关系中最大的摩擦点之一。

其三，美国将关键技术、数字基建、网络安全、5G/ 云计算、半导体供应链等议题纳入地缘政治框架，迫使地区国家在技术领域选边站队，将严重制约中东国家产业升级与数字转型。中东国家将日益受制于外部合规审查与政治压力，导致安全依赖向发展领域蔓延，发展规划易受外部安全议程左右，创新生态与数据治理被迫遵循外部标准。这种结构性压力显著压低了中国与中东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合作上限，项目审批、融资结算、设备采购、人才交流等方面均面临更强限制与不确定性，大幅增加机会成本、压缩自主选择空间，令地区国家在大国竞争中愈发难以维持平衡。

三、中东地区安全格局重塑仍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安全架构方面，特朗普政策持续助长阵营对抗风险，破坏国际社会构建中东安全架构的努力。特朗普执意将伊朗排除在地区安全秩序之外，试图通过整合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建立排他性新秩序。这严重阻碍了建立真正持久、可持续、包容的地区安全架构。当前中东变乱交织，巴以问题持续动荡，以伊冲突升级。当前，

中东正站在建立包容性安全秩序或继续动荡的十字路口。²²

建立新安全秩序的关键在于构建包容性架构，实现阿拉伯国家、伊朗、以色列、土耳其四大力量协调。2023 年中国成功斡旋沙特与伊朗和解，为中东安全架构提供了重要基础。然而，特朗普外交政策力推《亚伯拉罕协议》，将阿以关系正常化建立于排斥伊朗、边缘化巴勒斯坦问题之上。此举虽冠以“和平”之名，实质却将中东推向内塔尼亚胡鼓吹的“光明之弧”对抗“邪恶之弧”的阵营化深渊。²³ 尽管阿拉伯国家在美国和以色列压力下仍坚持推进与伊朗关系正常化，但在特朗普政策影响下，双方合作阻力重重。阿拉伯世界对伊朗的戒备与敌意犹存，加之美国对其政策渗透极深，这些都使中东包容性安全新架构建设面临更大困境。缺乏包容性与共同安全理念的架构，难以建立稳定的地区安全秩序。

四、中东地区战略自主将进一步提升

特朗普中东政策具有双重性，虽然短期内制约了他国参与中东事务，但长远而言，该政策将进一步催化中东地区形成战略自主，推动地区国家间再平衡，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热点问题的解决空间。地区国家将不再视美国为唯一的安全“托底者”，而是将其视为在缺乏其他选项时的无奈选择。因此，海湾国家的“战略对冲”行为将更加常态化。它们将在依赖美国军事威慑的同时，继续深化与伊朗的外交接触以规避邻里冲突，同时加大与全球南方在能源、基建及非敏感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特朗普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回光返照”，但无法改变美国在中东地区相对衰落以及地区多极化和自主性上升的趋势。

特朗普以自我为中心且唯利是图的外交政策，在迫使地区国家曲意逢迎美国的同时，也使其深刻认识到美国外交承诺与安全保障的不可预测性。因此，中东国家

22 Staša Salacanian, “Middle East instability will persist without a new regional security order,” Stimson Center, September 3, 2025, <https://www.stimson.org/2025/middle-east-instability-will-persist-without-a-new-regional-security-order/>.

23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Coventry Branch, “Netanyahu’s speech at UN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7, 2024, <https://unacov.uk/netanyahus-speech-at-un-general-assembly/>.

在积极迎合美国之余，正日益将对美外交置于其整体多边平衡战略的框架内。一个关键例证是：以色列空袭卡塔尔后，沙特阿拉伯虽持续寻求美国安全保护并争取成为非北约盟国，但也积极推动对外安全关系多元化，²⁴与巴基斯坦等国建立安全合作。同时，对比特朗普两次中东访问议程可见明显转变：第一任期访问中，地区国家议程很大程度上仍受美国主导，突出表现为组建所谓“反恐联盟”；而在第二任期访问中，议程更多聚焦人工智能等发展领域。这固然体现美国技术霸权的影响，但更核心的驱动因素是地区国家自身发展诉求的彰显。

特朗普外交政策实践为中东风云注入新变量，客观上推动了有利于全球南方拓展关系的格局重组。阿拉伯国家、伊朗、以色列、土耳其四大力量长期动态平衡，维系区域传统稳定。任何一方过度扩张均会引发警惕与制衡，形成结构性张力。2010年以来伊朗通过“抵抗轴心”扩张影响力，促使阿拉伯国家加速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此趋势虽表面强化亲美阵营，却使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全球南方大国在阿伊间面临严峻“选边”压力。特朗普第二任期明确偏袒以色列，助长其地缘扩张，导致四极格局明显向以色列倾斜。这种失衡反而刺激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三方增强内部协调与合作意愿。长远看，此态势或削弱单一域外大国主导能力，为全球南方力量创造战略机遇。这些国家可依托相对中立立场与发展导向合作模式，助推地区力量再平衡，并为构建更具包容性与自主性的安全架构开辟空间。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虽然延续了美国一贯的霸权主义逻辑，但其对军事介入的排斥以及对塑造自身“和平缔造者”形象的执着，在客观上降低了中东地区受到大规模外部干预的风险。同时，他对中东冲突调停与斡旋表现出特定兴趣，尤其体现在巴以问题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此类地区热点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与关注度，从而为相关问题的对话与解决创造了潜在的政治空间。总体而言，该政策在延续美国战略传统的同时，也为特定区域的冲突管理提供了非典型应对路径。在此背景下，美国战略重心的相对转移及其介入方式的局部调整，客观上为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

²⁴ Financial Times, “Saudi Arabia signs ‘strategic mutual defence’ pact with Pakistan,” September 17, 2025, <https://www.ft.com/content/50a48a5a-a022-411d-803e-bbd804f99563>.

方行为体更深入地参与中东和平进程提供了潜在机遇。中国等新兴力量可凭借其相对中立的政治立场、发展导向的合作模式以及日益增强的外交能力，在尊重地区国家主体性的前提下，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通过搭建对话平台、推动发展合作、参与战后重建等方式，为弥合分歧、补充现有机制、探索可持续方案贡献多元思路与资源，助力中东安全架构走向更均衡包容的未来。

关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于1960年，是隶属于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高级研究机构和知名智库。我院的主要任务是：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咨询为方向，通过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的全方位研究，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通过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合作交流，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多年来，我院一直被国内外权威机构评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智库之一。

我院设有六个研究所，分别是全球治理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台港澳研究所；同时，我院设有十一个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拉美研究中心、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中东研究中心、非洲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南亚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中心、海洋与极地研究中心、世界与上海研究中心。此外，我院还设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沪港澳合作研究中心，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民间外交研究中心、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等项目制研究平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编辑出版的中文刊物《国际展望》双月刊，《上研院报告》（中英双版）和英文刊物《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季刊已经成为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论坛。

主 编

陈东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执行主编

李 忻 上研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编 辑

陈 雪 上研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出 品 人

李开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执行出品人

毛瑞鹏 上研院智库发展与科研服务处

副处长（主持工作）

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

© 本报告版权归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所有

联系方式：

地 址：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195 弄 15 号

邮政编码：200233

联系电话：+86-21 54614900

传 真：+86-21 64850100

<http://www.siiis.org.cn>



© 2026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5-15 Tianlin Road,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200233, PRC

Tel/Fax: +86 21 64850100

www.siiis.org.cn

更多免费行业报告

并购家

www.ipoipo.cn